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发展^{*}

章舜粤

[内容提要] 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参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和割裂毛泽东思想两种错误倾向。1973年复出后，邓小平发扬运用毛泽东思想中关于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部分，批评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试图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局。他关于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逐渐成熟，为他在其后反对“两个凡是”并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准备。

[关键词] 邓小平 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改革开放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理论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出了必要准备。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坚持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邓小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学术界已有较为系统的研究^①。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认识并不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启的，而是起源于新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新中国史研究青年项目“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陈东林：《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刘金田：《邓小平领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宋月红：《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肖建平：《邓小平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研究》，《现代哲学》2018年第5期。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方面，他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杰出贡献，是新中国成立后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参与者。另一方面，他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1973年复出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了深邃的思考，为改革开放后领导全党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创立邓小平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能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离不开他长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思想与认识。本文试图梳理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历程，并概括其基本特征与经验，以此纪念邓小平同志。

一、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率部解放大西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主要负责人。这一时期，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初步尝试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新中国的建设。

1945年，中共七大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指出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①，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则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②。换言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一方面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一方面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对此，邓小平不仅有深刻的体悟，也积极参与了整风运动，开始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术语，并推动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1943年6月5日，他在主持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会议时，针对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定要运用于实际，才能表现力量”，必须“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使之切合于中国实际”^③。11月10日，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又指出，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后，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得以胜利发展^④。12月18日，他又再次强调，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思想”上^⑤。这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面临新的革命和建设任务，邓小平始终坚持“革命必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0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5—1974）》（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80页。

④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⑤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5—1974）》（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把它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之一”^①。他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没有先进理论的武装，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②。

在党的建设方面，他主张发扬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的经验，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党内外的形势均与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鉴于一些新党员思想作风不纯，一些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对此，邓小平指出这次整风主要是要“查思想、查作风”，要看党员干部是否执行党的政策、联系群众，“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以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④。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抓住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以建设新中国。对此，邓小平已初步认识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丰富极了”，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用之于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⑤。他强调，历史一再证明，“不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遭受挫折和重大损失^⑥。而毛泽东“千方百计地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些理论来灌溉我们的党”^⑦。邓小平提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大问题就是大问题，是小问题就是小问题，不应当犯的错误就不应当犯”^⑧。从中可以看出，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邓小平心目中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所在。

总之，这一时期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他坚持延安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判断，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将其运用在建设新中国的新实践中，而这也是他一生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基调。

二、邓小平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⑨。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邃的理论思考，先后提出了正确处

①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79页。

②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25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1—152页。

⑤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255页。

⑥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254页。

⑦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272页。

⑧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141页。

⑨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57页。

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1952年后，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并在中共八大以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不仅使得邓小平对全党的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毛泽东的理论思考与领导实践有更近距离的观察、对毛泽东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由于他本人深度参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事实上也影响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首先，邓小平始终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搞革命和建设。1956年11月17日，他在回答国际青年代表团成员提出的“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是适合于中国的”这一问题时，援引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的历史经验，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他同时又指出：“原则的运用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①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具体国情一步步地推进改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这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传的。

其次，邓小平始终把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作为指导思想，强调根本的工作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指出，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②，“就是要承认千差万别、大同小异，所谓‘大同’就是大的方针政策，‘小异’是重要问题，都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正确判断”^③，“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④。他总结“大跃进”中的惨痛教训，关键就在于“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⑤，必须着力于恢复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就是要积极干，实事求是，讲老实话，当老实人”^⑥。

邓小平高度关注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1956年，毛泽东在经过大量调研和深邃思考后，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邓小平发挥运用其中蕴含的相关思想，多次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⑦。例如，1957年4月，他在视察陕西时，肯定时任陕西省委负责人把《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比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

②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79页。

③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81页。

④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146页。

⑤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81页。

⑥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113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1页。

喻为“骨头”和“肉”，指出我们过去“对解决‘肉’的问题也是求新求大”，在城市规划等方面“对‘肉’重视不够”，今后要注意解决这一对关系^①。196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取得更大的成绩，“特别是我们采取打歼灭战的办法，强调质量，搞先进技术，搞得快，搞得省，搞得好”，并着重强调，“这也是毛泽东思想”^②。

邓小平特别注意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独立自主的问题，同时也强调要吸收借鉴一切人类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他指出，学习苏联好的东西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还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先进的经验^③。

邓小平还提出，要坚持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他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化多端的，社会是越发展越复杂”，因而如果没有“双百方针”，“我们的思想就会简单化，就跟不上世事、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党就会衰退”^④。

与此同时，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当时在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过分强调甚至只讲毛泽东思想，而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容易给人一种错误印象，即毛泽东思想是独立于马列主义之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另一种错误倾向是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即将毛泽东的个别字句都视为毛泽东思想，赋予其过分的地位。对此，邓小平头脑十分清醒，坚决抵制这两种错误倾向。

1954年11月18日，他在中宣部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强调要正确解释毛泽东思想。当时，因毛泽东曾批示不应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中宣部提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理，但在讲解党章的时候和过去党的重要的文件决议时仍按照原文讲解。换言之，即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要说明毛泽东思想不是独立于马列主义之外的思想，而要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从而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⑤。邓小平对此高度关注，强调那种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各地都可能有”，并要求中宣部将拟好的通知送他看后转毛泽东、刘少奇看后再发出，提醒中央领导集体重视这一问题^⑥。后来，他在山东、天津等地视察工作时向地方领导干部谈过这一问题，“在中央也议了”^⑦。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对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提法问题的请示的批复》中又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6—267页。

② 参见《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4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54页。

⑤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

⑥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3页。

重申了这一意见,指出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提,避免人们误解它们是两回事,而正确的理解是“‘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①。3月7日,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又强调,“宣传上要思前顾后,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不可分的,是它的发展”^②。

1960年3月24日和25日,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在天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天津会议”)。“天津会议”是在“反右倾”斗争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努力抵制“反右倾”斗争的过火倾向,坚持纠“左”的思路。同时,他在会上多次提出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反对庸俗化毛泽东思想。3月24日,邓小平提醒到,最近有一种偏向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提出“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③。第二天,邓小平主持会议,系统地论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第一点,他反对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商店的营业额增长也算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④。此前,1959年,容国团获世乒赛男单冠军,为新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体育比赛冠军。面对当时一些宣传的说法,邓小平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⑤第二点,他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联系。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⑥。

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观点,毛泽东本人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表示同意。^⑦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文件,试图扭转这种不良风气。除了上述一些指示外,还例如1962年中共中央同意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祖国医学遗产的研究和继承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指出,“在学术问题上,必须坚决反对‘乱贴标签’的现象,如说中西医综合疗法就是‘毛泽东思想’,中医的‘辩证论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等”^⑧,反对庸俗化毛泽东思想。1964年,中宣部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反对简单化、庸俗化、贴标签、实用主义”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3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3页。

⑤ 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3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2页。

⑧ 《关于改进祖国医学遗产的研究和继承工作的意见》(1962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0页。

的口号^①。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正确的态度未能坚持下去。

总之，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参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和割裂毛泽东思想两种错误倾向。从思想的脉络看，这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后进一步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邓小平在复出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发展

尽管邓小平等人坚持正确认识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庸俗化和割裂毛泽东思想两种错误倾向，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两种情况愈演愈烈。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②。1969年4月，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③，这就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正确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混为一谈，好像二者是自洽内在于一个理论体系一样。这样，一方面是曲解了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两种错误倾向没有得到完全的扭转，使得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形成了巨大的思想混乱。而“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④，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混乱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倒退，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于1969年10月被下放江西劳动。在江西劳动生活期间，尽管邓小平犹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⑤，“与外界是隔绝的”^⑥，远离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但他一方面认真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和各种哲学、历史书籍等，一方面与当地的工人接触，从子女的书信中获取信息，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坚持进行理论思考，并不断与现实生活相对照。这使得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和立体。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的政治处境有所好转。1972年8月3日，远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一方面，他再次向毛泽东检讨，“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

① 《陆定一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03页。

②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第2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第627页。

③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6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⑥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56页。

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①。但同时，他又坚持表示过去在两点上“一直是不同意的”。一点是林彪等人“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的提法。另一点则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②。邓小平对林彪等人割裂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毛泽东思想的批判，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全面的发展”的认识，与他“文革”前的观点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邓小平的政治处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仍旧非常艰难，邓小平何以在对毛泽东检讨自己“没有高举”的前提下，坚持强调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面理解，值得深思。

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并于1974年底重新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得以对近十年来的乱局加以整顿。1975年1月6日，他刚刚复出，就找来胡乔木谈话，考虑组织一个写作班子^③，研究诸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毛泽东谈过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④。这说明邓小平此时已经在考虑如何研究总结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成果问题。换言之，即试图对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发展做一个理论上的总结，并以此指导整顿和建设。

此后，邓小平又负责主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卷的编辑工作，这使得他有机会系统性思考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理论贡献。1975年6月15日，他致信中央政治局，提出重新整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谈对立的统一》等稿子，“还要阅读毛主席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讲话等，有的还可考虑编进去，如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⑤。他尤其重视《论十大关系》，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多次参与读改工作，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⑥。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想法被毛泽东否定了。

同时期，在领导全面整顿过程中，邓小平组织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个重要文件，强调：“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不能丢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5）》（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92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60页。
③ 即后来的国务院政研室。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任何一项，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项。”^①但这三个文件在1976年6月被诬蔑为“三株大毒草”加以严厉批判。此外，毛泽东本人也否定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说法，表示他“没有讲过”^②。此事和否定《论十大关系》的发表，透露出毛泽东本人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邓小平的认识有所不同。

尽管遭遇重重困难，邓小平还是竭尽全力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毛泽东思想的做法，为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而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9月10日，他在出席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时指出“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严肃批评“现在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对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③。这就提出了总结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任务。他同时还回顾了延安整风时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历史经验，指出其“仍然有重大现实意义”，强调要“重新宣传毛主席的这些思想”，以用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派性，反对新八股”^④。

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在出席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时又指出，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老五篇”等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他强调，“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⑤。

同时，他还努力恢复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1975年7月初，毛泽东在同邓小平谈文艺工作时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⑥7月9日，邓小平向国务院政研室工作人员传达毛泽东这一意见时谈道：“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指出“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⑦。此后，国务院政研室工作人员调研发现，从1969年11月以来，“双百方针”在报刊等中提得极少，大部分文章只引用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三句话，而不引用“百花齐放”^⑧。10月4日，邓小平在农场工作座谈会上批判割裂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时候，就以此为例证指出：“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⑨

①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7页。

②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6—107页。

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95页。

⑦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⑧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⑨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

总之，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对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他发扬运用毛泽东思想中关于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部分，批评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试图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局。遗憾的是，邓小平很快被错误撤职、批判，第三次被打倒。虽然他推动正确、全面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努力被打断了，但他此时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一套”，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的观点逐渐成熟发展，为他在其后反对“两个凡是”并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结 语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①，并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②。这一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吸收，并最终在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③。邓小平是这一发展过程中最核心的人物。然而正如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不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才提出来的，而是与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思考与实践中的得来的，这其中有一条极为清晰的思想脉络。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坚持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换言之，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脉络中去认识毛泽东思想，而反对那种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的错误认识。

二是坚持将毛泽东思想视为一个思想体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⑤。

三是坚持以实践检验真理。邓小平之所以信服毛泽东思想，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在延安整风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提及，中国革命多次遭受重大挫折，“全国各地都受到损失，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方没有受到损失”，而“正是由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9—160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于事实摆在党的面前”，才使得毛泽东思想得到全党的认可，成为党的指导思想^①。同样的，他也主张用实践成果来检验党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绩。1960年，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曾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对工作中的失误有所反思，提出“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主张调查研究，探寻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②。邓小平对此高度赞赏，指出“错误不可能不犯，问题是善于总结教训”，提出“到一个阶段总结一次”^③。实际上，这就是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并在实践中发展真理。

四是坚持从国际视角认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同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邓小平对此有深刻认识。一方面，他坚持在国际上捍卫毛泽东思想，反对“老子党”“教师爷”，指出无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只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④。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庸俗化毛泽东思想，指出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⑤，要“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⑥。

总之，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正确、全面认识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与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行为做了坚决的斗争，这一切为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邓小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充分准备。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牢牢把握和充分运用贯穿在邓小平这些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封世蓝）

①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25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21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5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45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35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2页。